

梁思成文集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梁思成文集

(一)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封面题字 赵朴初

## 梁思成文集

(一)

\*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北京阜外南礼士路)

\*

开本: 787×1092毫米 1/16 印张: 24<sup>1</sup>/<sub>2</sub> 插页: 6 字数: 380千字

1982年12月第一版 1982年1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00册 定价: 6.00元

统一书号: 15040·4104

本书是《梁思成文集》的第一卷，共收集了我国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的十篇遗稿。其中九篇曾发表于解放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一篇是解放后写的，曾刊于《文物参考资料》。主要内容有关于蓟县、宝坻、正定、晋汾和京郊等地区的古建筑调查；杭州六和塔的复原状计划；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等。这些遗稿反映了梁先生研究古建筑的成果。本书可供古建筑研究人员、古建筑修缮人员和大专院校师生参考。



梁  
冀  
集

## 编辑说明

梁思成先生长期从事建筑教育事业和中国古建筑研究。自三十年代起，他用科学方法大量调查研究了中国古建筑，发表中国著名古建筑调查报告十八篇和《清式营造则例》、《营造法式注释》等著作，并有中国建筑史和中国雕塑史未刊稿两篇。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到国外讲学，用英文写了六篇介绍中国古建筑的文章。解放后，梁思成先生以巨大的政治热情，对北京市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提出很多重要的建议，还在许多杂志报刊上发表建筑史和建筑理论方面的论文和科普性的文章。现在，我们收集和整理了梁思成先生的遗稿，编为《梁思成文集》，计划分四卷出版。

第一、二卷为古建筑调查报告，内容包括解放前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过和未发表过的。这些文章基本上按著述先后编排。另外，有些调查报告是梁思成、刘敦桢、鲍鼎等同志合写的，经与有关单位协商，决定由这些单位共同编成专集，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不再收入本文集中。而梁思成与林徽因合写的则仍保留在《梁思成文集》中。

第三卷是解放前的史稿与论文。

第四卷是解放后的论文、建议信和科普文章。

四卷编入的文稿共有五十篇左右。

此外,《清式营造则例》和《营造法式注释》作为专著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另行出版,不包括在本文集内。

鉴于解放前的古建筑调查报告是陆续调查、陆续发表的,当时对中国古建筑的调查研究,还处在开创阶段,难免有疏忽或与后来的发现有矛盾之处,因此,我们邀请和委托在京工作的单士元、刘致平、莫宗江、罗哲文、王璞子、杜仙洲、祁英涛、余鸣谦、傅熹年等同志分工负责校订。校订的原则是除限于当时情况,有个别明显的错误,必须更正或加注外,凡属学术观点上的不同见解,仍保留原貌;著作中某些与学术无关的,现在又不需要登载的个别段落或字句,根据梁思成同志生前的意见,由编辑组酌情删去。在编辑和校订工作中,还得到梁思成先生生前旧友杨廷宝、童寓、陈植等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以及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研究所、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林宣等同志的大力协助,提供宝贵资料,特在此致谢!

我们对梁思成先生解放后的文章一般不作专门校订。他发表的关于城市规划和建筑设计方面的意见至今还有其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在图版和照片方面,由于抗日战争中营造学社的大批图纸、照片和底片寄存在天津,被大水所淹。所以,本书中所用的线条图大部分是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翻拍的,

少数是重描的。照片有的用水残重印，有的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翻拍，只有个别的采用解放后新拍的照片代替。文中的公尺，均改为米。

本书的编辑工作由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吴良镛同志主持，张静娴、林洙两同志担任具体编辑工作，建筑史教研组其他同志对此工作给予了支持和帮助。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或资料遗漏，或编排不当等缺点，自不可免，希望读者批评和指正。

清华大学建筑系

1980年5月



## 序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建筑家。他对我国的建筑事业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梁先生一生的辛勤劳动，留下了关于建筑的论文、报告和专著等共有六十余篇。包括：古建筑的调查报告和论文；建筑理论、建筑设计、城市规划的文章和建议；以及有关建筑教育和科普文章等。现在我们将其中有重要学术及史料价值的文章报告四十五篇整理出版。此外，梁先生早在三、四十年代就已经着手，并在六十年代继续撰写的《营造法式注释》一书卷上业已整理完毕，即将另行出版。其它过去已发表过的专著如《清式营造则例》等亦拟陆续再版。

梁先生在大动乱的年代里，离开我们，现在已经八年了，梁先生文集的编辑和又停顿了十年的《营造法式注释》，是在1977年以后才得以继续进行的。作为梁思成先生的学生，追随先生学习和工作多年，我们整理遗篇，重读华章，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引起了无限深切的怀念。

梁思成先生是广东新会人，梁启超先生长子。1901年出生于日本东京，1915年至1928年就学于清华学堂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大学研究院。1928年以后，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解放后，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建筑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二、三届人大代表，三届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

梁思成先生是我国建筑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他为我国建筑教育先后创办了两个建筑系。1928年当他从欧美游学归来，任东北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先后聘请陈植、童寓先生以及已故的蔡方荫、林徽因先生任教。这个学校在“九一八”事变时被迫停办。抗日战争一结束，梁先生又以兴奋的心情筹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梁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当年自己亲自担任过多门讲课。他对青年的热情关怀，他的渊博的知识，对专业的真挚感情，身教言教，对于鼓励青年热爱专业，树立良好的学风和为祖国的建筑事业的献身精神具有

极大的感染力。早年东北大学的学生如今都已成为有造诣的老专家，而他后期的学生，多已在祖国各地成为骨干力量，“桃李满天下”这个成语，对梁先生说来是毫不过誉的。

梁先生早年在美国学建筑时，见到当时大量文物流落异土，伟大丰富的祖国建筑遗产国外了解无几，国内研究者寥寥。面对这种文化落后的状况，梁思成先生以激昂的爱国热情，把一生主要精力从事古建筑遗产的研究和整理工作。

梁先生对古建筑的研究，从建筑实物调查入手，用他自己的话说，先以曾在清宫营造过的老工匠为老师，以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为课本，以北京故宫为标本，以“大木作”为中国建筑结构的基本“文法”，先把清代建筑营造方法及其则例弄通；在此基础上，由近及远，将宋《营造法式》与清著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这两部“文法课本”互相比较，“以今证古，承古启今”，并实测宋辽金实物，互相印证。从而将晦涩难解的中国古代重要建筑巨著弄懂弄通，进一步加以整理，用近代建筑表现方法图解注释，为研究宋以前古代建筑打下基础。他说：“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美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见原画一瞥。秉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庭”。这种收集大量事实，重视实验，比较研究的方法是科学的，具有创造性的。梁先生和当时营造学社文献部主任刘敦桢先生分工合作，披荆斩棘，率领学社其他同人，足踏十六省、二百余县，涉猎建筑文物、城乡民居及传统城市计划等二千余单位，为我国古建筑的研究开创了自己的道路。中国建筑史上的一些重要遗构如佛光寺、独乐寺、赵州桥、应县木塔等都是当时发现鉴别和测绘的。今天有些文物建筑虽已荡然，而图样史料得以幸存，一些世代相传的建筑经验得到了记录，对中国建筑的历史发展从混沌中初步得到整理，中国建筑的古籍巨著得到释注。中国建筑的基本特征，中国古建筑以及城市规划、民居、园林、雕塑、装饰等方面所达到的辉煌成就得到总结和阐述，使中国古代建筑这一瑰宝，拂去尘埃，重放异彩于世界文化之林。梁、刘等先生开创之功，不可磨灭。“薪尽火传”，今天战斗在祖国古建战线的骨干就是他们培养出来的一支队伍。1946年梁先生应聘到美国耶鲁大学讲授中国建筑，并由普林斯顿大学赠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48年被选为当时的“中

央研究院”院士。这都表明了国内外学术界的承认和赞扬。

作为一个建筑史家，他很自然地关心古建筑的保存工作。远在抗战以前梁先生就作过曲阜孔庙、赵州大石桥、正定隆兴寺大佛阁修理计划等。有的图已画好，惜未能实现。抗日战争结束以前他曾经编写过全国各地古文物建筑目录。还曾托人转送一份给当时正在重庆的周恩来同志。无论在解放前后他对北京旧城以及其他各地文物保护的宣传更不遗余力；梁思成先生对古建筑的维护工作，也有其独到的见解。例如“整旧如旧”这一类梁先生特有的风趣的词汇，被沿用下来，成为古建筑维修工作的一条原则。

梁思成先生勇于接受新生事物。比较早地就思考建筑理论、设计创作以及城市规划等方面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濒近结束，梁先生注意到当时西方建筑界热烈讨论关于战后城市改造和居住环境问题。1947年赴美讲学归来，他曾发表“住者有其房”，重视“体形环境”的倡议，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虽属空想，但也是一种不满时弊的呐喊。这时梁先生转向社会，从考察历史进而面向现实。从古建筑扩至城市环境，不断追求新知，这是进步，是值得肯定的。尽管他对共产主义并不了解，1948年在等待着祖国解放的时期，却浏览着有关城市理论书籍在期待着明天！北京解放了。他从党和人民政府的方针政策中，看到中国人民多少年来梦寐以求的一个统一、团结、富强的新中国就在眼前。为了认识这新社会是怎样来的，应当如何去建设它，他努力地学习马列著作。他高兴地认识到过去以为建筑师们开出的可以医治现代城市疾病的妙方良药，不少地方由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局限，乃是难于实现的空想。而新中国却提供了使它变为现实的美好前景。作为一个爱国知识分子，他以满腔热忱，投入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担任了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项工作。

对北京的城市规划，梁先生做了不少工作，提出过方案和许多建议。他曾提出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建议建设新的行政中心；保存北京故都的面貌，保存古建筑城墙城楼；限制旧城内新建筑高度不得超过三层；以及限制城区工业的发展等许多意见，并为之写文章、作报告、奔走呼号，尽了一个建筑工作者应尽的职守。他在五十年代发表的《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文章，多是为此而作的。

在建国初期，全国都在贯彻执行“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号召。梁

先生当时能结合北京应是政治中心、文化中心这一特点,提出重视环境保护、防止工业污染、保护文化名城的面貌等意见,现在看来,实在可以说是难能可贵了。

对于北京旧城的改造他并不是主张一切都保留原状。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是连‘泰山石敢当’那块界石都不准动”,而是为适应新的需要进行改造,而又力求保存有价值、有意义的历史面貌,不要弄得面目全非,破坏其珍贵的历史价值。巍峨壮丽、气势雄伟的北京城墙城楼,是古城特有的标志,它与城内的紫禁城、钟鼓楼遥相呼应,形成北京美丽独特的天际线,是北京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上封建时代名都大邑中,也是唯一得以完整保留下来的。他坚决反对拆除城墙城楼,并作了改造利用的方案。通过各种方式陈述他的意见,为此作了很大努力。梁先生多次反对为使马路取直,方便交通而把北海团城和金鳌玉蝀桥拆掉另建新桥的改建方案,他的这个意见最后得到周总理采纳。现在保留了团城,展宽了原有的石桥和马路,达到了既便利交通,又保存了原有环境面貌的良好效果。

建筑设计和创作不是梁先生一生建筑活动中的主要部分,但他对设计创作道路问题,一向重视,不断思考。他从事中国建筑的研究,还希望作到有助于设计创作,达到“为中国创造新建筑”这一目的。早在1935年他所主编、刘致平先生编著的《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中就发表了这一见解<sup>[注]</sup>,当然这些见解不可避免受那个时代的建筑思潮如折衷主义和国际现代建筑流派等多种影响的局限。后来思想的发展也各有其时代背景。但梁先生五六十年前所提出的“为中国创造新建筑”这一命题,至今仍然是有待研究的问题,至于探索过程中所经历的曲折的道路,就不能苛求于古人了。

梁思成先生热爱党,热爱党的事业,他对党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解放以前他不过问政治,对党也是不了解的。1948年12月清华园解放了,正当梁先生和同志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的时候,解放军的干部来到梁先生家里,要求他帮助编制北京古建筑地图,以备攻城时给以保护避免遭受破坏。惊讶和

---

[注] “我们希望他们认清目标,共同努力为中国创造新建筑,不宜再走外国人模仿中国式样的路,应该认真的研究了解中国建筑的构架组织,及各部做法权衡等,始不至落抄袭外表皮毛之议。”《建筑设计参考图集序》。

兴奋之余，作为一个对共产党不了解的学者，震动是很大的。从此开始了他对新社会学习、认识，到最终致力于终身为之服务的新的历程。这种对党的感情也表现在他对老一辈革命家崇敬和热爱上。他积极地从事党所交给他的各项工作，梁先生是一位学者，但他却以自己热爱祖国，热爱党的一片热忱，积极地发挥先锋作用。在全国解放初期，当一些知识分子由于对革命形势不了解，尚在观望时，在梁先生的影响和努力下，团结邀罗了不少人才，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当年和梁先生共事的一些老同志们，对此记忆犹新。梁先生对于他的主张是能坚持的，同时也是能虚心接受意见的。在1955年对建筑界的错误倾向提出批判后，他虚心自省，对大屋顶所造成的浪费深感惋惜，但在一些学术问题上又迷忽徬徨。还是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在周总理、陈毅同志鼓励启示下，梁先生振奋精神，“先把旧有的工作拣起来”，重新继续了搁置了多年的宋《营造法式》研究工作。也就在这一时期作了《真武阁——一个杠杆结构》的调查报告，并兴起了整理论文集的念头……可惜因为狂风恶浪的动乱，夺去了他的时间，否则他还可以作更多的工作。但即使如此，他在艰难的生活条件下，在重病之中，仍孤寂地对一些文章进行过删削工作。

梁先生献身于建筑事业的精神，也是很令人感动的，为了进行建筑的调查研究，长途跋涉，爬高就低，不辞劳苦。在一次测绘中，为了登上塔顶拍照，手把铁索，两脚悬空地攀上，那时天气已近寒冷，而铁索更是凛冽刺骨，助手们望而迟疑，而梁先生却身先士卒。去佛光寺测绘，报告中云：“摄影之中蝙蝠见光振翼惊风，秽气难耐，工作至苦，同人等晨昏攀跻，或佝偻入顶内，与蝙蝠壁虱为伍，或登殿中构梁，俯仰细量，探索唯恐不周……”。在旧社会出于名门世家而能作到如此不辞劳苦是不容易的。而每有发现，“则又惊诧，如获至宝”，只有寄怀于学术的人，才能达到如此忘我境界。在他四十岁左右，因患脊椎软骨硬化病，忍受着中枢神经受压的剧痛，不得不改在内业工作。他曾经身穿铁马甲，下巴依在一个花瓶上，伏案作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脊背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其艰难可以想象。《塔的分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拟出的初稿，由助手完成的。也就是在这同一个夏天，因患牙病，需把牙齿全部拔光，每拔完一次牙，要痛一、二天，而《市镇的体系与秩序》这篇文章，就是依在床上读完老萨里宁（E·Saarinen）《论城市》这本书后有感而发的。解放以后他更积极地参

加许多重大的工作，如国徽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方案设计等。工作完成或行将结束，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大病一场。他和林徽因先生一样，疾病影响他的工作，但从未使他们终止工作。

梁先生是很爱护人才的，曾有某同志向梁先生介绍一位美术老师，事先说明“这位先生是有水平的，但性情耿直，有脾气”。梁先生说：“只要他有本领，我让他三分”。梁先生果然寄以极大的尊敬，传为佳话。在国徽设计中，这位老师作出了很好的贡献。

回顾梁先生的建筑活动和贡献，自然地会想起了林徽因先生，她是梁先生在美国的同学，早年学习美术与舞台设计，后专攻建筑，成了梁先生建筑活动的密切合作者，《清式营造则例》序言就是由她撰写的。她才华横溢，思想奔放，她以特有的对新事物的敏感，除了研究建筑历史之外，很早就注意国内外住宅问题，并对工艺美术、园林设计、室内设计与建筑装饰等广泛涉猎，有独到的见解。解放后，她不顾多年病魔缠身，积极地投入各项工作，为清华学生开讲座。清华大学在解放初期，对特种工艺美术，如景泰蓝的新设计图案的试验，也是在她的积极推动下进行的，为受多年战乱摧残近乎奄奄一息的传统工艺美术的振兴作了工作。她并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装饰文样设计等，作了不少探索。和梁先生一样，她对青年学生的热情培养，也是令人十分感动的。每有学生来访，总以振奋的心情尽情地为学生讲解，古往今来，对比中外，谑语雄谈，敏思遐想，使初学者思想顿感开扩。学生走后，常气力不支，卧床喘息而不能吐一言。这样一位尽瘁于建筑事业的人过早地结束了她的生命，是非常可惜的。这一部文集其中有她的辛勤劳动，是对梁先生的纪念，也是对她的纪念。

吴良镛 刘小石

1980年12月

## 目 录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	( 1 )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	( 39 )
蓟县观音寺白塔记·····	( 111 )
宝坻县广济寺三大士殿·····	( 117 )
正定调查纪略·····	( 166 )
赵县大石桥即安济桥·····	( 231 )
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	( 265 )
晋汾古建筑预查纪略·····	( 281 )
平郊建筑杂录·····	( 343 )
平郊建筑杂录 (续) ·····	( 353 )

## 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sup>\*</sup>

敦煌文物研究所在北京举行的展览是目前爱国主义教育中一个重要的环节。通过这个展览，通过敦煌辉煌的艺术遗产，我们从形象方面看到了的不只是我们的祖先在一段一千年的长时期在艺术方面伟大惊人的成就，而且看到了古代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敦煌的壁画还告诉了我们，中华文化之形成是由许多民族共同努力创造的果实；在那里，我们看到了许多今天中国的少数民族的祖先对于中华文化的不容否认、不可磨灭的贡献。敦煌的壁画还告诉了我们，在当时，这些壁画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的（虽然是为当时广大人民的宗教迷信），而且是人民的匠师们所绘画的——敦煌的壁画没有个别画师的署名；在题材方面，若不是天真地表现一个理想的净土，就是忠实地描画出生活的现实，再不然是坦率地装饰一片墙壁上主题间留下的空隙。敦煌壁画中找不出强调个人，脱离群众，以抒写文人胸襟为主的山水画。在敦煌窟壁上劳动的画师们都是熟悉人民的生活的、大众化的艺术家。通过他们的线条和彩色，他们把千年前社会生活的各方面的状态，以及他们许多的幻想，都最忠实地——虽然通过宗教题材——给我们保存下来。敦煌千佛洞的壁画不唯是伟大的艺术遗产，而且是中国文化史中一份无比珍贵、无比丰富的资料宝藏。关于北魏至宋元一千年间的生活习惯，如舟车，农作，服装，舞乐等方面；绘画中和装饰图案中的传统，如布局，取材，线条，设色等等的作风和演变方面；建筑的类型，布局，结构，雕饰，彩画方面，都可由敦煌石窟取得无限量的珍贵资料。

---

<sup>\*</sup> 关于唐以前建筑的概括性论述，梁思成先生曾写过两篇文章。第一篇是《我们所知道的唐代佛寺与宫殿》，发表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第一期。第二篇即本文，发表在1951年出版的《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五期。本文后出，包括了前文的内容并有所发展，时代也扩大到北朝至宋初，所以在文集中收入了这一篇。



中国建筑属于中唐以前的实物，现在的绝大部分都是砖石佛塔。我们对于木构的殿堂房舍的知识十分贫乏，最古的只到五台山佛光寺八五七年建造的正殿一个孤例<sup>校注〔一〕</sup>；而敦煌壁画中却有从北魏至元数以千计的，或大或小的，各型各类各式各样的建筑图，无异为中国建筑史填补了空白的一章。它们是次于实物的最好的、最忠实的、最可贵的资料。不但如此，更重要的是这些壁画说明了：在从印度经由西域输入的佛教思想普遍的浪潮下，中国全国各地的劳动人民中的工艺和建筑的匠师们，在佛教艺术初兴、全盛，以至渐渐衰落的一千年间，从没有被外来的样式所诱惑、所动摇，而是富有自信心的运用他们的智巧，灵活的应用富于适应性的中国自己的建筑体系来适合于新的需求。伟大的建筑匠师们，在这一千年间，从本国的技术知识艺术传统所创造出来的辉煌成绩，更证明了中国建筑的优越特点。许多灿烂成绩，在中原一千年间，时起时伏，断断续续的无数战争中，在自然界的侵蚀中，在几次“毁法”、“灭法”的反宗教禁令中，乃至在后世“信男善女”的重修重建中，已几乎全部毁灭，只余绝少数的鳞爪片段。若是没有敦煌壁画中这么忠实的建筑图样，则我们现在绝难对于那时期间的建筑得到任何全貌的，即使只是外表的认识。敦煌壁画给了我们充分的资料，不但充实了我们得自云岗、天龙山、响堂山等石窟的对于魏、齐、隋建筑的一知半解，且衔接着更古更少的汉晋诸阙和墓室给我们补充资料：下面也正好与我们所知的唐末宋初实物可以互相参证；供给我们一系列建筑式样在演变过程中的实例。它们填补了中国建筑史中重要的一章，它们为我们对中国建筑传统的知识接上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

所长常书鸿先生命作者撰稿介绍敦煌的建筑。作者兴奋地接受了这任务，等到执笔在手，才感觉到自己的鲁莽，太不量力，没有估计到我所缺乏的条件。现在只好努力做一次抛砖的尝试。

### 我们所已经知道的中国建筑的主要特征

在讨论敦煌所见的建筑之先，我必须先简略地叙述一下中国建筑传统的

---

校注〔一〕此文写在1951年初，那时五台县南禅寺大殿、芮城五龙庙正殿、平顺天台庵等唐代建筑尚未发现，佛光寺是唯一已发现的唐代建筑。